

刘仲华 著

世变、士风与

清代京籍士人学术

Shibian Shifeng yu

Qingdai Jingji Shiren Xueshu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刘仲华 著

世变、士风与

清代京籍士人学术

Shibian Shifeng yu
Qingdai Jingji Shiren Xueshu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变、士风与清代京籍士人学术/刘仲华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300-18375-6

I. ①世… II. ①刘…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史-北京市-清代 IV. ①B249.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63332 号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世变、士风与清代京籍士人学术

刘仲华 著

Shibian Shifeng yu Qingdai Jingji Shiren Xuesh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张	33 插页 2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87 000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言

清代京籍学者众多，清初有孙承泽、张烈，康熙时期有王源、刘献廷，雍正至乾隆初年有黄叔琳、黄叔璥，乾嘉时期有朱筠、朱珪兄弟以及翁方纲、何国宗、雷学淇等人，嘉道时期则有朱锡庚、徐松、徐有壬等学者。清代京籍学人虽然不如江南地区那样大家辈出，群星璀璨，但也独具特色，自成一脉。

首先，从学术史的区域性视角来看，研究这些人物，很有必要。以“区域”审视学术发展的传统，在我国传统学术发展史上源远流长，无论是以地域为标志的“乡贤”学术特征的总结，还是学案体中对学术师承的梳理，都具有“区域性”的视角。清学发展同样呈现出区域化的多样性，以考据学而言，就有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之别。此外，浙东学术、常州今文经学等，也大多是学术区域性特征的反映。相比于以上区域性学术流派的研究，目前对清代京籍学者的学术特色及其在清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还没有给予相应的关注和认识。

“区域”视野下的“清代北京学术”到底该如何界定呢？是清代发生在“京师”区域内所有的学术活动，抑或仅仅是京籍学者的学术活动？由于北京在清代作为“首善之区”的特殊性，前者显然会包括官方学术活动以及所有曾经发生在北京的学术活动，这既包括京籍学者的治学，也包括大量非京籍学者在北京所从事的学术活动，甚至还有不少旗籍学者的治学。毫无疑问，这是个有相当纵深的学术视野，绝非笔者所能驾驭。因此，本研究选择京籍学者这一单纯线索作为“区域”的界定标准，虽不尽合理，但便于把握。

其次，学术往往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集中反映，而京畿学术与清代

政治社会生态的关系密切，京籍士人治学反映了清代不同历史阶段下知识分子的内心关怀和精神状态。这是我关注清代京籍士人学术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清初而言，无论是孙承泽还是王崇简，他们的治学和“出处”都围绕着反思明亡和社会秩序重建这两个问题。与当时政治军事领域的统一进程相应，思想文化领域也在反思王学的过程中走向了新的整合。在官方推动下，程朱理学再次被确定为庙堂之学，而且张烈、张能鳞等京籍理学士人在清初政治社会秩序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治世大官少而小官多，乱世大官多而小官少。”深入剖析这些“治世小官”，有助于理解清初重建社会秩序的过程和意义。与此同时，还有一股深受明遗民学术影响的学风，带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和针对清政府的不合作倾向。践履此风者大多是功名不显的遗民子弟，其学术取向大多讲求致用，但结果往往是所学无用，身后凄凉。京籍的刘献廷和王源就是这一风气的代表人物。就清初京籍学者的治学而言，无论是遗民还是降臣，都依然秉持着关怀“天下”的儒者经世意识。

进入康熙中期以后，由于统治的逐步稳固和财力的增加，统治者一方面通过不断倡导官办学术工程，加大对士人学风的培育和塑造；另一方面也通过文字狱，加大对反清思想和不合作者的打击力度，结果在体制规范和生存利益的疏导下，士人逐渐疏远了传统士人“兼济天下”的担当意识。再加上诸如大兴朱氏兄弟、翁方纲等士大夫的以身作则与奖掖提倡，考据学蔚然成风，士人学术逐渐走向政府主导意识形态和学术风格的发展路径，正所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尽管考据学试图通过“训诂明则义理明”的方式构建自己的“道统”解释模式，但它毕竟不能像宋明理学那样，在为士人提供安身立命之地的同时，也为国家秩序建设和社会伦理的维护提供有效支撑。因此，乾嘉之际，考据学的流风余韵虽然仍旧强势，但在汉宋兼采的内在学术理路转变的驱动下，以及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的外在影响下，考据汉学也处在不知不觉的转变中，一味沉溺于音韵训诂的考据学已经不能满足人心，而关注现实的义理追求已是大势所趋。朱筠之子朱锡庚“礼外无理”的学术探索就反映了这一趋势。

嘉道时期，在社会危机尤其是国家乃至民族危机的触动下，有识之

士开始试图摆脱束缚，主张经世致用，甚至批判现实，士人治学又重新举起“内圣外王”的大旗，由此，道咸时期的学术开启了走出传统的转变过程。这一时期京籍学者徐松“睁眼看现实”的经世致用之学，虽然尚未完全摆脱考据学的强大惯性，尚不具有“放眼世界”的境界，但边疆史地学的兴起，毕竟为鸦片战争后的学风转变铺垫了基础。寄籍宛平的学者徐有壬在吸收西学的基础上，推动了道咸之际传统算学的一度兴盛，但无奈科学技术并没有成为时代变革的动力，其本人殉难于太平军战乱的结局反映了时代的觉醒尚未到来。

总之，清代京畿学术具有影响范围大、与时代变化关系密切、学术性格保守等显著特征。清初大儒孙奇逢曾经说：“学术之废兴，系世运之升降，前有创而后有承。”^①这句话一是说学术的兴衰关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二是学术的发展存在着前因后果的关系，后一个时代的变革能力完全取决于前人所播下的种子。清代北京学术发展明显地受到不同历史阶段政治社会生态的制约和影响，是每个历史阶段文化精神的一面镜子，更决定了当时乃至后续社会发展的应对能力。

再次，京畿学术在清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其独特面貌。突出的一点，就是京师学术平台为游学士人的学术成长提供了条件。“古者学莫不有师”，“师友者，学术所从出”^②。如方苞，早年随宛平人高裔来到京师，从学数年。高裔不仅在生活上给了方苞很多照顾，而且在学业上有很多指导，对方苞的学术成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交游能够在短时间内为世人所知，扩大名声，这一点对于那些没有功名的士人尤其重要，所谓：“末学小儒，不得大君子之磨砺，终不能有所成就。”^③康熙元年（1662），阎若璩“始游京师，合肥龚尚书鼎孳为之延誉，由是知名”^④。戴震游历北京之前“困于逆旅”，不为人所知，到北京以后，

①（清）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四，《北学编序》，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92册，6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02。

②（清）梅文鼎：《绩学堂文钞》卷三，《梁质人四十寿序》，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13册，389页。

③（清）陆陇其：《陆稼书先生文集》卷一，《上魏环溪先生书》，见《丛书集成新编》第76册，413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④（清）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一，《阎若璩》，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获交于钱少詹大昕，称为天下奇才”。后来，“高邮王文肃公安国请君至家塾，课其子念孙，一时馆阁通人如河间纪昀、嘉定王编修鸣盛、青浦王兰泉先生、大兴朱笥河先生，皆与之定交，从此海内知东原氏矣”^①。

京师作为辐辏之地，为不少学者扩大学术影响创造了条件。正如钱泳所言：“诗人之出，总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则不出也。”^②相反，如果作者交游不广，或者传承无序，其学术研究成果或者思想，就会长期湮没，无人问津，甚至最后失传。

学术积累，也在很大程度上因学术交游而不断传承、丰富与发展。如孙承泽作《五经翼》，朱彝尊作《经义考》，翁方纲又作《经义考补正》；孙承泽增订《北溪字义》，黄叔瓚在此基础上作《广字义》；王士禛对黄叔琳、翁方纲等人的影响，翁方纲的肌理说、金石学以及汉宋兼采的主张对当时学风转移乃至后世学风的影响；黄叔瓚作《国朝御史题名录》，后苏树蕃续补，瑞霖再补。诸如此类的学术传承和积累都与学术交游密不可分。

京师丰富的学术资源，也是推动清代学术发展的重要条件。例如，顾炎武为获取有关《春秋》研究的几本著作，通过曹溶的介绍认识了孙承泽，成为孙氏的座上客，并于康熙六年（1667）入都之际，从孙承泽处借阅《春秋纂例》、《春秋权衡》、《汉上易传》等书。自称为“江左遗民”的谈迁，为修改、补充《国榷》，于顺治十年（1653）借为朱之锡作幕友的机会，用两年时间到北京搜集史料并访问前明遗老遗少。在北京，他首先认识了藏书家曹溶，后来又经曹溶介绍结识了吴伟业，谈迁不仅从他们那里看到了万历实录、邸报等重要史料，而且也通过与他们的交谈，了解到明末许多重要史事。此外，他还到处寻访明朝降官、贵族子弟、太监、官僚士绅等，以核对史书。朱之锡在为谈迁《北游录》所写的序中记述了谈迁到处踏勘、搜集材料的情形，他说：“盐官谈孺木，年始杖矣，同诣长安，每登涉蹶蹶访遗迹，重趼累茧。时迷径，取道于牧竖村佣，乐此不疲，旁睨者窃哂之，不顾也。”^③可以说，谈迁在朱之锡幕中的北游经历对于其

① 《汉学师承记》卷五，《戴震》，85～86页。

② （清）钱泳：《履园丛话》卷八，《谭诗》，206～2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③ （清）谈迁：《北游录》，朱之锡序，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

《国榷》的最后完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京师频密的学术活动，也是京畿学术发展的重要条件。有清一代，北京的官办书局很多，并都能提供丰富的书籍文献，使进入各类史馆、纂修馆的学者能够目睹个人无法见到的文献档案，从而促进了学术发展。清初《明史》纂修馆就是清初南北学者交游的重要机缘。而且这一纂修工程持续近一个世纪，对学术大发展有相当的影响。《明史》开馆之初，首先是征集史料，尤其是崇祯一朝的史料，众多曾经在崇祯朝做过官的人纷纷著书，或者将自家所藏文献档案呈送《明史》馆，以备纂修所用。清代京籍学者也受此影响，如孙承泽著《山书》，王世德著《崇祯遗录》等书，张烈著《王学质疑》、《史法质疑》等书。张烈、王源、刘献廷等人还都曾参与《明史》纂修。又如《全唐文》纂修馆，嘉庆十四年（1809），徐松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他利用当时查阅图书资料的优越条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河南志》、《宋会要辑稿》、《中兴礼书》。此外，他还撰有《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等书。

清代京畿“区域”学术的形成和发展既得益于以上有利的条件，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但同样也受其制约和束缚，存在“大树底下无芳草，大块之间无美苗”的不利影响。京畿的这种学术环境，曾经让很多有追求的士人又爱又恨。清初的杨宾就发出过“少小畏京师，人情苦莫测”^①的感慨。戴名世一面批评京师达官贵人招摇声名、助长虚文应酬的浮躁风气，另一面却也不能超然物外，声称：“余卖文燕市，曾不值一钱，主人与之一镒两镒，计日佣赁而已，非以文章故而雠其值也。至于朋友宾客之来乞者，亦多有，亦非以文章可爱重故也。余非智不知此而自取贱役，盖家无担石之储，而居家则尤为乡人之所贱恶。”^②道光年间的沈垌同样如此，他治学强调经世，主张“欲为有用之学，于都中居为最宜”，对于游学京师非常向往。可等到他游历京师以后，却发现“都下惟利为最重，挟高资入京师，科第固唾手可得，名流巨公亦鳞集云附。

①（清）杨宾：《睇发堂诗集》卷五，《留别顾景范》，见柯愈春整理：《杨宾集》，49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②（清）戴名世：《燕市杂录》，引自〔法〕戴廷杰：《戴名世先生年谱》卷四，209～21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无此妙券，而但挟学以求，殆矣。‘读书’二字，今殆将绝矣”^①。尽管现实很残酷，打击不小，自己也很失望，但他依旧盘桓于京师，“久留不去”，根本原因还在于“寓食”京师不仅免于“饿死”，而且“古籍缤纷，足资搜讨”^②。

最后，从“区域”丰富“整体”学术史的需要来看，梳理清代北京学术发展也很有必要。自章太炎、梁启超、钱穆等人开创并奠定清代学术史后，对清代学术的研究往往围绕一些约定俗成的著名学者序列展开，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到惠栋、钱大昕、戴震，再到阮元、俞樾、孙诒让等人，几乎成了著名学人的谱系图。这固然能很好地体现著名学人对当时学界以及整个清代学术的重要影响，但是往往忽视了对那些所谓“不重要”的学术人物的考察。过于关注少数学界精英的学术思想，却忽视了这些精英背后广泛的学术基础，即过于注重大传统，而忽视了小传统。

“区域”学术史绝不是“整体”学术史的地方化表现或缩略本，而是反映学术发展复杂性的必由之路。从“区域”学术史丰富“整体”学术史的途径来看，它有助于展现学术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助于揭示学术发展的鲜活面目，可避免整体研究所导致的单一模式和僵化面目。清代学术无论哪个阶段都非固化的铁板一块，它因地域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和差异化的特征。而学术史的区域性视角，更关注学术在一定时空内生存与发展的结构性要素，即政治社会乃至文化生态与学术发展的互动关系。另外，这一视角有助于关注“非主流”的学术人物。区域性的学术人物往往不是长期以来已形成共识的“著名学者”，而大多是一些不太知名的普通士人，有些甚至根本算不上“学者”，但这些普通士人往往是当时学术常态和社会主流精神面貌的真实反映。

历史研究的目的是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展现历史的常态，而不是一叶障目式的以偏赅全。学术史的研究同样如此，诸如顾炎武、黄

①（清）沈垚：《落帆楼文集》卷八，《与张渊甫》，见《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525册，461页。

②《落帆楼文集》卷八，《与张秋水》，456页。

宗羲、王夫之、惠栋、戴震一系的大学者，固然能够代表不同历史时期清学发展的高峰，但却远远不足以呈现清学的丰富和精彩。如同地图上长江、黄河的线条能够让人对这两条河流的走势一目了然，但却不能呈现三江源头的涓涓细流一路向东奔向大海的生动场面。同样，顾、黄、王等人固然是清初学者群中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最吸引人的几位，但他们并不是当时社会精神面貌的全部。如果用他们代表清初学术的整体面貌，必定会掩盖更多的真实。因此，我们需要挖掘更多“被代表”甚至被忽视的学者的思想状态。

目 录

第一章 清初降臣的处世及其学术交游	1
第一节 孙承泽与清初降臣学术	1
一、易代之际的出处选择	2
二、退居之后的学术著述	9
三、入清后与遗民、降臣的交游	32
四、晚年与理学家的交往	48
五、与朱彝尊的交往及其学术影响	62
第二节 王崇简人生境遇及其处世心态	71
一、加入复社与其明亡之前的交游	72
二、逃亡江南的痛苦、失望经历	77
三、鼎革之际的出处选择	84
四、入清后的交游及其处世心态	90
五、时势与学术之间的诗文思想	99
第二章 清初遗民子弟与经世致用学	106
第一节 处士刘献廷“放翻宇宙”的广阳之学	106
一、交遍天下的游历生涯	107
二、表彰忠烈豪侠，鄙视变节与钻营	122
三、“眼光放在极大处”的经世思想	126
四、会通中西的治学视野	133
第二节 王源交游及其遗民子弟的一生	143

一、交游及其境遇	144
二、遗民心态及其经世思想	166
三、后继无人的学术命运	176
第三章 理学与学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	183
第一节 张烈尊朱斥王及其在清初学术重建中的境遇	183
一、参修《明史》，反对立《道学传》	184
二、攻驳王学，坚决反对“不朱不陆”	193
三、理学名臣陆陇其、张伯行对《王学质疑》的 刊刻与散布	202
四、尊王学以及持调和意见者的批评	209
五、颜元、李塨超越门户之见的批评	213
第二节 理学循吏张能麟与清初地方社会秩序的恢复 重建	215
一、任职仁和令，清理漕兑积弊，移风易俗	217
二、提学三吴，以兴教化为己任	219
三、守道四川，兴修水利，不忘敦化风俗	228
四、分守山东，劝勉风俗	231
五、学术思想以及与理学家的交往	235
六、理学循吏在清初政治社会恢复重建中的作用	238
第四章 社会稳定之下的宦游与御用之学	243
第一节 “北平黄先生”的北学与交游	243
一、历仕三朝，世称“北平”	243
二、早年理学训练与理学之用	251
三、走向经史考据的撰述	254
四、学术交游与提携后人	262
五、黄氏藏书与四库纂修	269
第二节 黄叔瓚的宦游纪闻与晚年理学撰述	271
一、“操守尚好”的御史宦游	272
二、“学问与政事无二”：巡察御史的宦游纪闻	275
三、撰《中州金石考》，开创中州金石辑录的风气	280

四、与尹会一的交往,列名《北学编》	288
五、晚年理学著作的编撰	289
第三节 清代历算学家何国宗及其囿于御用的学术局限	294
一、父兄长期供职钦天监	294
二、康熙时期参与编纂《律历渊源》	297
三、雍正年间外放治河	299
四、乾隆年间再次以天文历算学受知	304
五、从何氏家学看清代科技发展的局限性	309
第五章 清中期士大夫弘奖风流与乾嘉学风	313
第一节 朱派经学与汉学群体	313
一、主持乾嘉风会近三十年	313
二、朱筠倡议开馆校书,推动考据学走向顶峰	323
三、倡导朴学不遗余力	327
四、广延名士,四方争归	333
五、宽容并包与清中期学术奇才	336
第二节 翁方纲的学术交游及其谨慎保守的治学方法与 思想困境	342
一、学术交游及其影响	343
二、汉宋兼采的学术思想	360
三、谨慎保守的治学方法	367
四、学术思想的困境	374
第六章 嘉道时期考据学的强势惯性以及朴学领袖的后继无人	379
第一节 雷学淇征信三代的古史研究	380
一、考订《竹书纪年》	380
二、古代历法研究	398
三、寻找通例的经学方法以及“求其会通”的 求实精神	403
第二节 朱锡庚的学术转变及其与阮元、章学诚的交往	407
一、从训诂考据到追求义理的学术转变	407
二、与阮元的交往及其“礼外无理”的学术主张	413

三、与章学诚父子的世代之交	422
四、朱氏后人凋零与藏书命运	428
第七章 时代动荡之下从考据走向经世的转变	432
第一节 以考据走向经世的徐松史地学	432
一、徐松在《全唐文》馆的文献考订与辑录	432
二、谪戍边疆，走向经世的契机	440
三、京师史地学的交友与徐松学术影响	445
四、交游圈的危机意识及其史地学的经世追求	464
五、以考据为途径的经世局限	468
第二节 危局之下算学家徐有壬的悲情命运	472
一、危局时代中的宦游	473
二、做官清廉谨慎，但终非所长	477
三、算学交友以及道咸时期算学家群体的形成	480
四、“不让西人”的算学成就及其影响	490
五、以算学经世及其学非所用的境遇	494
主要引用书目	502
后 记	514

第一章 清初降臣的处世及其学术交游

明清鼎革之际，众多士人因出处不同而被别之以遗民或降清者。但无论是遗民还是降清者，他们与清政权的离合，都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清入关后稳定中原和江南统治的进程，制约着清初政治与社会重建、恢复的步伐，甚至影响了清初统治者的很多制度建设和决策。以往，对遗民思想和心态的研究较多，至于当时人数众多、构成“满汉平台”主要力量的降清人物在入清前后的心理与治学变化则往往被简单化甚至忽视。事实上，降清人物的内心并非坦然平顺，他们的内心经历了自悔气节的煎熬和自我说服的纠结，对清政权的诚心悦服也经历了一个自我调适的过程。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在他们的学术交游和著述中。

第一节 孙承泽与清初降臣学术

孙承泽（1592—1676），字耳伯，号北海，晚年又号退谷逸叟，顺天（今北京）大兴人，先世籍山东青州府益都县。明崇祯三年（1630），乡试中举。翌年，登进士。历任河南陈留、祥符等地知县，以表现卓异，授刑科给事中，历升户、工科右给事中，刑科都给事中。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大顺农民军进占北京，孙承泽在“求死不得”的情况下投向农民军政权，被委任为四川防御史。然而，明清之际注定是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没过两个月，李自成军队在山海关战役中溃败，兵败西走。五月初二日，多尔袞率清军进占北京，孙承泽又投清，清廷复其刑科都给事中职衔。清顺治九年（1652），官吏部左侍郎，仍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但好景不长，孙承泽成为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牺牲品，被逼出仕途。顺治十一年（1654），吏部令其休致，遂不复

用。从此，闭门著述，“二十余年不问门外一事”^①。

自罢官至康熙十五年（1676）去世，孙承泽在退居生活的二十余年时间里，撰写了大量著述，仅《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便有23种之多，涉及经学、史学、书学等多个方面。在收藏和鉴赏金石字画之余，他撰写了《庚子销夏记》；所撰《山书》、《春明梦余录》、《畿辅人物志》等史学著述，或应朝廷征集史料，存前朝旧史，以志沧桑，或览历代人物，观古今兴衰；孙承泽自己最为看重的是理学著述，无论是《五经翼》、《孔易》，还是《春秋程传补》、《诗经朱传翼》，乃至《考正晚年定论》，都力尊程朱正统。经历明清鼎革的孙承泽在“气节不纯”的现实压力和内心焦虑下，以学术著述和交游寄托了自己对世运的感悟，其晚年无日不读朱子书的“老经生”追求，虽不乏“假借朱子以为重”的动机，但更多的是为排解其人生焦虑提供了安身立命之地。

一、易代之际的出处选择

孙承泽所面临的第一次出处选择是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后所建立的政权。据《明季北略》，农民军进入北京城后肆意搜刮，并没有采取措施稳定人心。“贼兵大索时，厚结长班及无赖子，使为乡导。本地乡绅如周镛、刘余祐、梁以樟、米万钟、吴邦臣、沈自彰等，咸蜂聚其家，恣意掠取，与籍没无异。至青衿白户，稍立门墙，不幸脱者。贼兵满路，手携麻索，见面稍魁肥，即疑有财，系颈征贿。”^②李自成军队进入北京后，很多士大夫都曾遭受勒索。《甲乙史》曰：“有稽勋司持刺召京绅刘余祐、孙承泽，甫即席，即问刘借四万金，孙二万，且曰：‘宜早办，若迟二日，即不得从容矣。’午后，唤诸文官进内点名，幽闭饥饿一日夜。至次早点过，共绑八百余员，五人一连，俱押锁至田皇亲府中，着刘宗敏用夹棍拷打，招认赃银，凡十昼夜。又拿京城富商居民，极刑追逼，

①（清）王崇简：《青箱堂文集》卷九，《祭孙北海少宰文》，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3册，516页，济南，齐鲁书社，1997。

②（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廿五癸丑拷夹百官》，478～4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死者千余人。”^①迫于无奈，孙承泽接受大顺政权四川防御使之职。^②据孙承泽在《天府广记》的自述，他是在数次求死不得的情况下才降附李自成大顺政权的。他原先决意殉崇祯皇帝，只是求死不得，大顺军执事者曾“温言慰藉”，并“日以饮食馈送”。在这种情势下，他才投向新政权，被委任为四川防御使。受职后，未就任。

士大夫在王朝易代之际必然会面临传统的忠孝价值理念与个人现实利益之间的纠结。而这个问题在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中往往是矛盾的，且在明清易代之际尤为突出。面对当时的情形，有人坚持传统的忠孝观念，“君亡与亡”，毅然“以死报君恩”；也有人被明末“不可为”的混乱政治局势严重挫伤了入仕的积极性，再加上易姓亡国，“夷狄侵夏”，结果逃禅入道，隐于山林，继承了伯夷、叔齐等人的遗民衣钵；王朝换代，“岂能举朝死之”，更多的士大夫则对“以死塞责”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们或勤王复仇，或入仕新政权。如果大顺政权能够长期立足，顺利完成王朝更迭的使命，那么孙承泽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才投靠新政权的问题并不会多么引人关注。然而时势总非人愿，在短暂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北京再次易主，孙承泽又降附清政权，再次作了“贰臣”，其入清后心理上所背负的“出处”阴影也更加沉重。

这种心理压力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孙承泽总是试图向后人解释自己在明亡之际的举动。其晚年纂辑《天府广记》，在《成德传》中就有交代了自己在明亡之际的表现：

成德，怀柔人，少倜傥有大志，以忠孝自负。为诸生时，因家近京师，每闻逆阉魏忠贤窃柄肆虐，则斫几狂叫曰：吾恨不能为天下杀此贼！……每过同年孙承泽寓，相对唏嘘流涕。时流氛已至昌平，巡视京营科道，请催营兵登陴，不报。上谓户部既称无饷，内帑业已如扫，各官速为集议。公谓泽曰：事迫矣，无可议，宜催京营诸公勒兵上城，吾辈各罄所有。又劝商民议输，支持旦夕，以俟

① 《明季北略》卷二十，《廿五癸丑拷夹百官》，477页。

② 《明季北略》卷二十《选升降臣》：“《甲乙史》云：三月廿六日，选升四品以下百余人……六科则……孙承泽。”（482页）